
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5 省 465 户返乡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

陈国生¹ 肖瑜君¹ 李海波² 张琨³ 张红艳⁴¹

(1. 湖南工学院 商学院, 中国湖南 衡阳 421002;

2. 长沙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湖南 长沙 410022;

3.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湖南 衡阳 421001;

4.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脱贫战略的实施都具有重要影响, 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城际差异进行研究有助于为各地区创业政策的精准制定和创业活动的精准开展指导提供参考。文章基于 5 个省 6 个城市返乡农民工家庭的样本数据, 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和多水平模型实证分析了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与城际差异。研究发现: (1) 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 3 个微观变量和居住地教育环境、居住地居住条件、地区消费水平、地区房价水平 4 个宏观变量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2) 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存在城际差异, 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教育环境、地区消费水平和地区房价水平对城市间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变异聚集性具有影响。根据地区特征, 有针对性地加强针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返乡创业支持体系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关键词】: 返乡农民工 创业选择 城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 D42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2) 01-0176-06

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是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 还是解决农村就业和脱贫问题的重要渠道。自 2015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以来, 在国家和各地方政府一系列鼓励和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号召下,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情显著提升, 据国家发改委统计, 截至 2019 年 6 月, 全国返乡创业人员已超过 800 万人。在鼓励和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已成为我国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潮流、农民工返乡已成为一种农村转移人口流动新趋势的背景下, 探讨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因素和城际差异, 进而找到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和提升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有效路径, 更好发挥农民工

作者简介: 陈国生 (1965—), 男, 湖南常宁人,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E-mail: chenguosheng04@163.com; 张红艳 (1979—), 女, 湖南邵阳人,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E-mail: 2956951043@qq.com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 (20B065、21B0877); 湖南省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项目 (XSP21YBZ066)

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内生驱动力，不仅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一个值得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既受农民工个体及家庭特征的影响，又和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有关。探讨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这种地区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是地方政府制定适合本地区特征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精准提升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重要前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学术界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由来已久，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学者们围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从微观层面的创业者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因素到宏观层面的地区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因素展开了大量研究。在个体特征方面，学者们研究发现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对农民工创业具有显著影响。如，王亚欣等以 QB 村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为例，实证发现创业者的学历和对创业风险的态度对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意愿影响显著^[1]。孔祥利等基于 CHIP2013 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年龄和教育水平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呈倒 U 形分布^[2]。石智雷等根据 1019 位返乡农民工及其家庭的调查数据发现，文化程度较高、交际能力强的青壮年农民工返乡后自主创业的意愿更强^[3]。在家庭因素方面，学者们研究发现家庭人口、家庭收入、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等因素对农民工创业具有显著影响，例如，朱明芬等认为家庭人口越多、家庭承包耕地面积越多，农民越容易创业^[4]。罗明忠基于广东省梅州市和广州市的调查数据，实证发现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5]。李长生等认为信贷约束和社会网络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具有显著影响^[6]。在宏观因素方面，已有文献对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已有研究普遍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创业的核心因素，朱明芬等研究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农民越容易创业^[4]。朱红根等认为农村地区良好的金融环境和政策支持有助于提升农民的创业意愿^[7]；蒋剑勇等的研究表明，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创业榜样影响农民的创业决策^[8]。也有学者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例如，朱华晟等认为，国内农民工的异地非正规创业是农民工个体在迁入地、迁出地环境特征与市场机会识别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要素资源状况所做的经济利益最大、成本和风险较低的理性选择^[9]。

学者们对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也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首先，已有文献大多侧重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已有文献对不同城市、不同省份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差异研究相对较少，对导致这种地区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关注更少，难以深入揭示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地区特征及内在机理，降低了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基于此，本文基于 5 个省的调查数据，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法和多层次模型分析法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因素、返乡农民工创业城际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文运用 5 个省份的样本，相比于大多数文献基于一个小区或一个城市的调查数据，研究更具代表性，同时，本研究分析了不同城市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可完善已有研究在此方面的不足。

1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自于课题组 2019 年 3~10 月开展的问卷调查。该问卷调查旨在了解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调查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按照随机抽样原则，在东部、西部、中部分别选择江苏、浙江、云南、贵州、湖南 5 个代表省份，省以下各选 1~2 个县级单位（区、县或者县级市），在每个县级单位选择 100 户左右返乡农民工家庭作为调查对象，在泰兴市、杭州富阳区、水城县、宣威市、长沙县、衡东县 6 个县（区、市）获得 532 份问卷，剔除无效与有缺失值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465 份。

1.2 变量选取

1.2.1 被解释变量的选择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Entrepre）。在指标的选择上，本文用问项“返乡后的工作性质”来测度，选择“创业”的，赋值为1，选择“务农”和“务工”的赋值为0。

1.2.2 解释变量的选择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参考已有相关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4个变量来反映个体特征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在家庭特征方面，选取家庭年总收入。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也受创业地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居住地教育环境、居住地治安环境、居住地居住条件以及地区消费水平、地区就业水平、地区房价水平6个变量作为地区环境因素的代理变量。同时，考虑到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把创业所在城市变量引入模型。

进一步进行t检验，比较创业和没有创业两组返乡农民工中各个变量的平均水平，结果显示，除了性别、家庭年总收入、地区消费水平3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解释变量在两组样本中的均值都存在显著差异，初步说明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

1.3 研究方法

1.3.1 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法

最优尺度回归分析（Optimal Scaling Regression）是专门用于解决模型中存在多分类变量的分析方法，该方法是在保证变换后各变量之间的联系成为线性的前提下，通过将分类变量不同取值进行量化处理，从而将分类变量转换为数值型进行统计分析^[10]。基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分类特征，本文采用最优尺度回归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模型如式（1）所示。

$$Entrepre_i = \sum \alpha_i P_i + \sum \beta_i R_i + \gamma_i income_i + \lambda_i city_i + \varepsilon \quad (1)$$

式中：Entrepre 是被解释变量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P 是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出生年代、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4个变量；R 是地区环境因素，包括居住地教育环境、居住地治安环境、居住地居住条件、地区消费水平、地区房价水平和地区就业水平6个变量；income 是家庭年总收入；city 是所在城市； α_i 、 β_i 、 γ_i 、 λ_i 是系数； ε 为误差项。

1.3.2 多水平模型

农民工返乡创业既在微观层面受创业者个体及家庭特征差异的影响，又在宏观层面受到创业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创业文化、创业政策等经济社会特征差异的影响，因此城市组内的样本并不完全独立，存在聚集的可能性。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数据结构特征，本文采用多水平模型（Multilevel Models）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城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多水平模型如式（2）所示。

$$Entrepre_{ij} = (r_{00} + r_{01}x_{ij}) + (u_{0j} + u_{1j}x_{ij} + e_{ij}) \quad (2)$$

式中：Entrepre_{ij} 是被解释变量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表示第j个城市中第i个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可表达为固定效应部分（ $r_{00} + r_{01}x_{ij}$ ）和随机效应部分（ $u_{0j} + u_{1j}x_{ij} + e_{ij}$ ）； x_{ij} 表示第j个城市中第i个返乡农民工的各解释变量观测值； r_{00} 是平均截距； r_{01} 是表示协变量x在所在城市的平均效应估计值； u_{0j} 为随机变量，表示第j个城市Entrepre的平均估计值与总均数的离差值，

反映了第 j 个城市对 Entrepren 的随机效应； u_{ij} 表示 x 在不同城市所产生的特殊效应，反映城市间 Entrepren 的变异与 x 变化的关系； e_{ij} 是特殊项。

2 实证分析

2.1 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2.1.1 回归结果描述

最优尺度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 R^2 为 0.272，模型拟合效果可接受。方差分析 $P < 0.05$ ，表示回归模型整体显著，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并非每个变量都有作用，婚姻状况 ($p=0.165$)、居住地治安环境 ($p=0.874$) 和地区就业水平 ($p=0.620$) 3 个变量没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示这 3 个变量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模型中的城市、性别、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居住地教育环境、居住地居住条件、地区消费水平和地区房价水平都通过了统计检验。

重要性指标是根据标准化系数和相关系数计算出各影响变量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百分比，数值越大表示该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越重要^[10]。根据模型计算结果，重要性最大的是受教育程度，达到了 45.4%，城市、居住地居住条件和地区房价水平也都超过了 10%。婚姻状况和居住地治安环境的重要性为负数，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性接近于 0，该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婚姻状况、居住地治安环境和地区就业水平这 3 个变量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性别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虽然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是考虑到重要性指数接近于 0，可以认为性别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有限，在后续的分析中不再纳入模型。

2.1.2 回归结果解释

①返乡农民工个体和家庭特征对其返乡创业的影响。在个体因素方面，性别、婚姻状况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本文所用调查数据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采集的；另一方面，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一般是家庭共同的决定，所以受访者的性别、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对其创业选择的影响有限。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总收入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显著。创业受创业者个体特征和家庭所拥有各类资本的影响，年龄越轻，思维越活跃，在务工期间越容易接受创业精神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从而越有可能开展创业活动。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总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水平。物质资本是开展创业活动的基本保障，返乡农民工家庭拥有的人力资本越多，越有利于识别创业机会、获取创业所需信息和资源以及越有能力经营好企业，因此，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总收入越高的家庭，越有可能开展创业活动。

②地区环境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在居住环境方面，居住地居住条件、居住地教育环境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良好的居住条件和教育条件有利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居住条件和教育条件是影响农民工迁移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居住和教育环境有助于留住农民工，让他们在此安家落户，进而有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地区消费水平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消费水平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有阻碍作用，消费水平越高，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创业成本也越高，从而抑制了创业活动的开展。房价水平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究其原因，房子除了具有居住价值，还具有象征价值，是家庭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房价越高，意味着拥有住房家庭的财富越多，越有利于融资和获取所需创业资源，进而促进创业^[11]。居住地治安环境、地区就业环境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不受居住地的公共卫生和治安环境的影响，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不是因为就业环境不好而被动的选择结果。

③城市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本文所选取的 6 个城市来自中部、西部和东部不同区域的 5 个省份，不同地区、省份和城市间既存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家庭资本禀赋方面的差异，又存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创新文化、创业政策等经济社会特征方面的差异，这些都是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重要因素。

2.2 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城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多层次模型分析估计了 9 个模型，模型 A 为没有纳入截距和随机变量的对照模型，模型 B 为随机截距模型，假定各变量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随城市而变动。模型 C~I 为在随机截距模型基础上纳入了随机变量的模型，C~I 模型纳入的随机变量分别为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居住地教育环境、居住地房屋质量、地区消费水平和地区房价水平。

模型 B 的协方差参数估计显示，代表城市组内聚集性的常数项估计值为 0.0096，P 值为 0.210，大于 0.05 的临界值。但是，通过对模型 A 和模型 B 相比的似然卡方值的计算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当两者不一致时，一般的做法是以似然比卡方的结果为准。似然卡方值具体分析如下：模型 B 的拟合信息显示-2 倍对数似然值为 500.619，而模型 A 的值为 516.148，两者相差 14.529，这个差值就是两模型相比的似然比卡方值，两模型的参数个数分别为 12 和 13，差值为 1，这就是检验的自由度。根据似然比卡方值和检验的自由度查询卡方值分布表可知，相应的 P 值小于 0.05 的临界值，因此反映城市差异的估计值具有统计学意义，即不同城市的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有差异。

为进一步了解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城市间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差异，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把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有显著影响的 7 个变量分别单独作为随机变量纳入模型，通过对比分析纳入变量前后两模型的信息，对城市间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差异作出解释。

模型 C~I 的协方差参数估计显示，7 个变量的估计值的 P 值都大于 0.05 的临界，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样，接下来进行纳入变量前后两模型相比的似然卡方分析，计算方法与思路与前文一样。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教育环境、地区消费水平 3 个变量的 P 值都小于 0.05，而出生年代、家庭年总收入和居住地居住条件 3 个变量的 P 值大于 0.05，地区房价水平的 P 值虽大于 0.05，但小于 0.10，显然，似然比卡方分析与协方差参数估计的结果不同，在此，同样以似然比卡方的结果为准。因此，可以认为，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教育环境、地区消费水平和地区房价水平能够有效解释城市组间的变异聚集性，即对城市间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差异具有影响，而出生年代、家庭年总收入和居住地居住条件 3 个变量对城市间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差异缺乏有效解释。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5 个省 6 个城市 465 户返乡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首先，运用最优尺度回归法分析了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多水平模型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城际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个体和家庭特征中的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婚姻状况的影响则不显著；地区环境因素中，居住地教育环境、居住地居住条件、地区消费水平、地区房价水平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有显著影响，而居住地治安环境和地区就业水平的影响不显著。②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存在城际差异，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教育环境、地区消费水平和地区房价水平对城市间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变异聚集性具有影响。

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是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还是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对推进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农民工创业实践和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制定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与继续教育。基于人力资本在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积极作用，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应重视针对农民的技能培训，通过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层次、多主体的培训供给体系，切实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创业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支持，提升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提高农民工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方面的培训与指导。

第二，加强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体系建设。基于地区环境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重要影响，一方面要改善返乡农民工

居住条件和子女受教育环境,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为其开展创业活动提供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强创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立公益性的创业信息发布平台、优化创业服务产业环境、简化新创企业创建程序、建立创业培训与交流平台等措施建立强有力的创业支持体系,减少创业成本、降低创业风险,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

第三,强化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基于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城际差异,各地区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应结合各地区创业者或潜在创业者的个体与家庭特征以及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特征来设计,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精准提升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创业绩效。

参考文献:

- [1]王亚欣,宋世通,彭银萍,等.基于交互决定论的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3):120-129.
- [2]孔祥利,陈新旺.资源禀赋差异如何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基于CHIP2013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产经评论,2018,9(5):112-121.
- [3]石智雷,谭宇,吴海涛.返乡农民工家庭收入结构与创业意愿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0(11):13-23.
- [4]朱明芬.农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杭州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0(3):25-34.
- [5]罗明忠.个体特征、资源获取与农民创业——基于广东部分地区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2(2):11-19.
- [6]李长生,刘晓蕾,汪淑群.信贷约束、社会网络和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实施[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18(5):607-617.
- [7]朱红根,康兰媛.金融环境、政策支持与农民创业意愿[J].中国农村观察,2013(5):24-33.
- [8]蒋剑勇,钱文荣,郭红东.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农民创业决策[J].农业技术经济,2014(2):17-25.
- [9]朱华晟,刘兴.城市边缘区外来农民工非正规创业动力与地方嵌入——基于苏州市胥口镇的小样本调查[J].经济地理,2013,33(12):135-140.
- [10]李海波.保障房居住满意度影响因素及城际差异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50):11-19.
- [11]吴晓瑜,王敏,李力行.中国的高房价是否阻碍了创业?[J].经济研究,2014,49(9):121-134.